

TRUE COMPASS

EDWARD MOORE KENNEDY

心的指南针

爱德华·肯尼迪回忆录

[美] 爱德华·肯尼迪 著
王一旸 译



上帝宽广的胸怀、家庭温暖的怀抱、国家远大的理想，属于我们所有人，让我们仰望深邃夜空时迸发期冀，享受温暖阳光时产生感激，面对无止境的痛苦时涌现达观，以及抛却分歧、友爱互助时获得宽容。

Edward Moore Kennedy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TRUE COMPASS

EDWARD MOORE KENNEDY

心的指南针

爱德华·肯尼迪回忆录

[美] 爱德华·肯尼迪 著
王一旸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的指南针 / (美)肯尼迪 (Kennedy, E. M.) 著; 王一旸译.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0.9

书名原文: True Compass: A Memoir

ISBN 978-7-5075-3290-6

I. ①心… II. ①肯… ②王… III. ①肯尼迪,
E. M. (1932~2009)—回忆录 IV. ①K837.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7455 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5698

心的指南针

著者:(美)爱德华·肯尼迪

译者:王一旸

责任编辑:吴晶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址: <http://www.hwcbs.com.cn>

电话:总编室 010-58336255 责任编辑 010-58336193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本:720×1060 1/16

印张:24

字数:302 千

版次: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3290-6

定价:36.00 元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New York,**

New York,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权由美国纽约大中出版社
授权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

谨以此书献给薇琪，你是我漫漫长路上心的指引。

我的胸怀如汪洋般无垠，我的爱意似大海般深凝，不可穷尽。

——威廉·莎士比亚

躺在船头我望着船尾，水花荡起泡沫轻飞，月光照得船帆洁白如贝，帆间耸立着高高的船桅。

我为这美景而沉醉，我为这美景而轻吟，那一刻我忘掉了自己，忘却了生命。

我自由了！融入海水，我化作洁白的风帆和飞溅的浪花，化作那美景和音韵，化作月光与帆船，化在那星光影现的天际！

我不在意未来也不忧虑过去，平静、独立却又不乏拙趣，我比自己更大，或比人类更高，我只属于生命！

是的，如果非要这么说的话，我只属于生命。

——尤金·奥尼尔，《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

2008

Prologue The Torch

2008年5月20日，星期二，春光明媚。刚刚从药物麻醉中苏醒过来的我躺在波士顿一家医院的病床上，望着身旁的医生。医生用低沉的声音正告我时日无多，得把身后事安排一下，也好让亲戚朋友们有个准备。

就在我卧病期间，科德角的朋友和邻居们刚刚把帆船修整一新，为即将到来的夏季巡游和帆船比赛摩拳擦掌。我真想和他们在一起，就像以前那样。波士顿红袜队卫冕世界冠军的道路一片光明，总统预选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参议院的同事们按部就班地推动着立法工作，想来还有好多事等着我去做。

并非不信任医生的专业水平，但我的计划里还真就放不下那两个字。不行，我不能就这样离去。

我并不否认自己的生命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三天前，恶性脑瘤的症状其实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那时我正在海恩尼斯港的家中，这个记录了我一生大部分光阴的地方是我生活和快乐的源泉。每天清晨最惬意的事情莫过于带上心爱的葡萄牙水犬——桑尼和斯普拉什出门溜达一圈。那天早上刚和妻子薇琪在前厅喝完咖啡、闲聊片刻，我起身走向厨房，不想突然晕了过去。

在那之前，我的生活堪称完美。与薇琪16年的婚姻美满而幸福，她有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敏锐的洞察力，她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伴侣。乘着那条老旧的小帆船

米亚，我们共同度过了无数的快乐时光，甚至还曾一起沿着海岸线挑灯夜航。薇琪带给我一种平静和安宁的感觉，几乎让我以为生命只有这两个词可以形容。然而这样的生活一点都不单调，和这个幽默、激情、忠诚却又可爱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你永远不会感到单调。

薇琪和我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冬季，春天悄然来临。巴拉克·奥巴马和他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希望让我兴奋不已。1月27日，我登上了华盛顿大学的讲台，宣布支持奥巴马竞选总统的决定。在我的身后站着侄女卡洛琳·肯尼迪、儿子帕特里克和奥巴马。新旧希望^①在那一刻交汇，包围着我。支持奥巴马参选的决定在人群中激起雷鸣般的欢呼，欢呼声让我心潮澎湃——对这个国家未来的期待和对往事的片片记忆立刻浮现于眼前，催促我再次踏上竞选的征程。新的年代，新的竞选，新的征途，一扫过去的尘埃。“新一代的领袖再次站上历史的舞台，”我向欢呼的人群大声地宣布，记忆深处的一个角落回响起另一个熟悉的声音：此时此刻，让声音传遍每一个角落，不论朋友还是敌人，告诉他们新一代美国人已经接过火炬……^②

民主党的预选让人疲惫不堪，但是我却从中收获了快乐和喜悦。这种久违的感觉让我想起了1960年和杰克^③在怀俄明和西弗吉尼亚并肩战斗的日子；让我想起了1968年和波比^④一起在印第安纳和加利福尼亚一起度过的峥嵘岁月。“谁说我们不能活泼一点！”我冲圣安东尼奥的一群拉美裔选民不服气地嚷道，说完便拉开嗓门儿用蹩脚的西班牙语唱起了《哈利思科，别对我说放弃》^⑤。这首歌后来在拉瑞多我又唱了一次，感觉别提有多棒了。5月中旬，奥巴马赢下关键的北卡罗来纳州预选，在普通代表票^⑥上遥遥领先，有政治观察家认为民主党预选实际上已经结束。我其实很愿意陪着奥巴马把选战进行到最后，但这显然已经没有必要，南塔克桑德的海湾美景让我偷偷地开了小差。

5月16日，我同马萨诸塞州州议员巴恩利·弗兰克等人参加了新贝德福德鲸业国家历史公园的庆典并且为新竣工的柯森海事学习中心剪彩。这栋建筑于1997年遭大火损毁，我和巴恩利一道为它的修缮和功能改进筹集了资金。那天我状态特别好，上台演讲之前把事先准备好的讲稿甩在了一边，即兴表达了我对贝德福德、对

① “新希望”指奥巴马、帕特里克和卡洛琳等政治新星；“旧希望”则是指代他自己和两位兄长（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

② 语出约翰·肯尼迪总统当年的就职演讲。

③ 杰克即是约翰·肯尼迪总统。

④ 波比即是罗伯特·肯尼迪。

⑤ 乔治·内格瑞特（Jorge Negrete）的著名歌曲。

⑥ 美国民主总统预选的选票由两部分组成：普通代表和超级代表，前者每1票代表若干普选选民的意愿；后者每1票代表1个超级代表个人的意愿。

这片海湾、对这座公园的历史积淀由衷的热爱。薇琪后来告诉我，就在我台上演讲的时候，坐在身旁的芭芭拉·苏利奥提斯扭过身去悄悄地说：“他今天可真精神！”没错，我那天真的很“精神”。空气中弥漫着变革的气息，多么让人欢欣。我和薇琪原本打算第二天出海，那是我们一年来第一次航行。

然而，第二天早上一切都变了。

那时我正穿过客厅，还差两步就走到厅里那架大钢琴那儿了。记得50多年前，每到晚饭时间，母亲露丝总会在那架钢琴上弹奏一曲。杰克那时候又小又瘦，身上的套衫从来都皱巴巴的，可他会时不时一本正经地站在钢琴旁，跟着母亲的琴声唱上几句。杰克经常站的那个位置，我刚刚走过。

突然间，我感觉头晕。我朝门廊走去，那儿有几张大椅子，对面是我童年时代便已熟悉的美景：南塔克桑德的海景和一只只靠岸的帆船。“嗯，”我告诉自己，“坐在那儿呼吸点新鲜空气就没事儿了。”

可我还没能走到那儿，眼前的一切就变得很模糊，只记得我当时正穿过前门朝饭厅走去，然后坐在迪一张椅子上，之后，就躺在了医院里。

后来才知道，是帮忙料理家务的茱迪·坎贝尔及时地发现了我。茱迪大声地叫着薇琪的名字，她那时正坐在前厅等我回去。薇琪立刻跑到我身边，吩咐茱迪立刻打911，并且通知我在波士顿的私人医生拉里·罗兰博士。薇琪一边等着附近的救援人员赶到，一边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扶着我的头。她轻轻地抱着我，亲吻我的脸颊，拍着我小声地说：“没事儿的，会好起来的。”

4分钟后，第一个救护人员赶到了，他是海恩尼斯本地的警察。“我曾在军队做过医官。”他对薇琪说道。“谢天谢地！快进来！”其他救护人员大约半分钟之后赶到了我家。他们怀疑我是中风了，但是没办法确认，于是打算把我转移到医院去。科德角医院对我实施了深度麻醉以便进行一系列的初步检查。薇琪则和我在波士顿的私人医生们保持着联系，他们轮流和这边的救护人员通话。最后，波士顿的医生们决定用一架救护直升机把我接到马萨诸塞综合性医院。很快，我被送上了飞往波士顿医院的飞机。在这期间薇琪一分钟也没闲着，她把这个消息尽可能多地通知到了双方的家人。“我接着打电话给911，”她后来跟我讲道，“这消息一定会很快上新闻，得赶在这之前把消息告诉朋友们。”有家人询问是否应该来探视，薇琪总是回答道：“来，来，你们都来。”直升机载着我，在通往医院的半小时行程里一路疾驰。薇琪则搭好朋友——海恩尼斯消防队队长哈罗德·布鲁内尔的车随后赶到。在去波士顿的路上，薇琪不忘一个接一个地通知其他家人。

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从麻醉中苏醒过来。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躺在哪里，只记得之前坐在家中饭厅的椅子上，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很快，我意识到自己正躺在医院的房间里。薇琪用她那饱含爱意和焦虑的淡褐色眼睛注视着我，令我心中充满慰藉。后来医生告诉我，导致我晕倒的是某种深层病因引发的全身性发作，体内的每一条肌肉都急剧收缩，让我感到极度疼痛。

晚上，孩子们纷纷涌入病房，挨个和我拥抱。我们在海鲜大餐点了套大杂烩，还一起围着电视看了红袜队的比赛。

周一活体组织分析报告确认我得了脑瘤——左顶叶上有一颗恶性神经胶质瘤。医生私下告诉薇琪和我病情很不乐观——估计最多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了。

对于死亡我历来敬畏，它的突然来临曾不止一次让我陷入沉思，但是我有两个理由拒绝接受医生的推断。

首先，这源于我在逆境中坚忍不拔的固执性格，坚韧是父亲为我们兄弟姊妹灌输的诸多教育中的一种。他教导我们永不言弃，不要消极地接受命运；不管面对什么挑战，都要竭尽最后一丝努力。也许正是受到了这种信念的鼓舞，小乔伊在二战快要结束时自告奋勇地接受了一项高度危险的飞行任务，最后不幸牺牲。也许同样是基于这种信念，杰克在自己的鱼雷艇被日本人撞沉之后，顽强地漂浮在太平洋上等候着救援。我相信，依然是这种信念影响了亲爱的姐姐露丝·玛丽，上天无情地夺走了她的智力，而她却坚强而达观地生活着。她会笑、爱玩儿、酷爱四处旅行，甚至还很擅长交际。

其次，类似的论断我已经听过多次，老实说已经听得有些厌烦了。我尊重事实，一生听过不少可怕的消息，但我不希望也不需要自己被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我相信希望，我相信如果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困难至少还有成功的机会，而悲观的心态只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失败。我的基因里还真没有这种失败者的心态。不管怎样，对于这种“在劫难逃”的话我并不感到陌生。相比起得知两个孩子被诊断出恶性肿瘤后的痛苦，医生对我病情的那些预测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1973年，小泰迪年仅12岁，他膝盖后面的包块被诊断为骨瘤。医生告诉我们得这种病的人极少能活下去，但是我们一直坚信泰迪能挺过来。

泰迪后来被迫截肢，还忍受了两年极其痛苦的治疗。但是正如我说的那样，泰迪挺过来了。47岁的他现在已经结婚，是一位商人和律师，还是两个可爱孩子的父亲。同样，2002年女儿卡拉被诊断出患有“无法通过手术治疗”的肺癌。医生告诉我们，摆在她面前的是极小的生存概率。和当年泰迪生病时一样，全家人都拒绝接

受这一论断。医生对我们说，不管你咨询谁都会得出同样的结果。记得当时我只说了一句话：“我倒想看看其他医生都怎么说。”后来我们邀请了一批该领域的专家会诊，事实证明他们并没有异口同声地认为卡拉的病无法治疗。卡拉随即接受了手术和大剂量的化疗、放疗，我们一直陪伴着她做完了所有的化疗治疗。我为卡拉祈祷，就好像当年为小泰迪祈祷那样，还经常参加弥撒祷告。在我的引导下，卡拉树立起了自己的信念。7年之后的今天，卡拉已经是两个茁壮宝宝的母亲，健康、活力又充满朝气。在亲身经历和信念的双重鼓舞之下，薇琪和我决定再次放手一搏。我会尽力活下去，我要用自己的事例感染那些被凶耗折磨得失去希望的人们。

薇琪和我着手制定一个计划，“一步一步地来”，我们相互鼓励着。

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去航海，航海之于我无异于生命的隐喻。5月22日，星期三，我离开了马萨诸塞综合性医院，带着薇琪和水狗踏上了在海恩尼斯港静静等候我们的米亚。此次航行已然不仅仅是个隐喻：它是生命的确证。清风中，米亚灵巧地穿梭在南塔克桑德的碧波中，这片水域是那样的熟悉，65年前，杰克曾在这儿教我航海。一切仿佛都回到了从前，除了那群在岸上等着我们归航的记者们。

在科德角的这段日子里，最大的活动莫过于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举行的一年一度的费贾维帆船赛。这是整个赛季的开场赛，3000多名水手乘坐200多条各式各样的船，参加数个级别的比赛。大家从海恩尼斯港一直赛到南塔克桑德，两天后再从南塔克桑德返回海恩尼斯港。去年，薇琪、我、小泰迪和他的妻子琪琪还有其他朋友一起夺得了从南塔克桑德到海恩尼斯港的返程冠军。虽然大病初愈，我却仍然雄心勃勃地力图卫冕自己的冠军头衔。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薇琪，英明的大副表现出了一丝可以理解的犹豫。有幸的是天公作美，天气预报显示比赛期间天气晴朗，从南塔克桑德返回海恩尼斯港期间会有强劲的西南风，如此天气条件对我们所驾驶的纵帆船来讲简直是天赐良机。薇琪微笑着对我说：“干吧。”那是辉煌的一天，米亚获得了第二，船员包括薇琪、卡罗琳、琪琪、小泰迪和帕特里克，以及我们家的老朋友，康涅狄格州国会议员克里斯托弗·多德。

我请好朋友拉里·霍洛维茨博士利用我们比赛这段间隙组建一个医疗小组。拉里·霍洛维茨毕业于耶鲁大学医学院，曾做过我的幕僚长。20世纪70年代，拉里曾担任过我所领导的参议院健康小组委员会的人事主管。拉里接到消息后马上动员起他巨大的关系网，把医生们和权威医学研究中心的意见不断反馈给我们，还把专家们全请到了波士顿。

我对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医生们表示了欢迎。“谢谢你们，”我对他们说道，“我

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想表现得更加积极一些，希望这段经历能对别的人有所帮助。如果我能从中寻找到希望，也许就能为其他同病相怜的病友们带去希望。我愿意，我愿意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其他人带去希望。”会诊临近结束的时候，我们敲定了一个手术方案，辅之以化疗和放疗。和其他一些癌症不同，这个病得当作慢性病来治疗，第一阶段结束之后还需进行一系列的后续治疗。薇琪把这第一阶段的治疗方案叫做“震慑^①（shock and awe）”疗法。

几天后，我们按计划到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尔汉姆，在杜克医学中心接受手术。薇琪后来回忆说我一路上都在打电话，联系参议院的同事们帮忙处理与我有关的几个立法条款。我委任马里兰州精明能干的国会参议员芭芭拉·米库尔斯基牵头推动高等教育法案。有关心理健康方面的立法工作则拜托给了老朋友克里斯·多德^②；此外我还和众议院议长南茜·佩罗茜就两院合作的一些事项进行了交流，有些工作还没做完，暂时还不能提交国会审议。总的说来，我把个人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既不感到恐惧，也没有忧心忡忡，做好了准备与病魔鏖战到底。老实说，我并不需要事无巨细地把所有事情都安排一番，这些只是以防万一罢了。

手术成功地达到了预期效果。一周后，薇琪和我高兴地返回海恩尼斯港，路上我们开始商量怎么实施下一个秘密计划。这个秘密计划是我们决定接受手术那天定下的：如果手术一切顺利，我们将一起参加在丹佛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而且我还要登台演讲。

那个夏天我接受了放疗和化疗，薇琪和我开车在海恩尼斯港和波士顿之间来来往往，连续6周，每周5天。和之前的每次演说一样，在8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登台演讲成为了我交给自己的一项任务，也是那段时间我脑子里考虑的头等大事。日程安排恰到好处，医生说放疗将在7月底结束，放疗结束后体力会有所恢复，而全国代表大会定在8月底开幕，这个时间表非常理想。我一直都是个善于规划自己时间的人，从来都很准时，一想到有这么长一段自由时间可以支配，我立刻兴奋起来。可以说，准备演讲的过程其实是我那个夏天康复过程的一部分。

于是我开始了一个夏天的康复和航行，几乎每天都出海，同时计划着和民主党同仁们一道欢庆全国代表大会。小泰迪把自己的办公室搬到了杰克的老房子，就在隔壁。琪琪也带着他们的孩子基莉和小小泰迪一起搬了过来。卡拉和她的两个孩子格蕾丝和麦克斯也经常来看我，他们几乎在科德角度过了整个夏天。国会的日

① 语出当年越战的军事行动。

② 即康涅狄格州资深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多德。

程一有空闲，帕特里克也会回来看看我。薇琪的儿子科伦·拉克林正好在波士顿工作，经常开车过来和我们吃晚饭。科伦是我的继子，自他9岁起我和薇琪开始共同抚养他。卡罗琳·拉克林刚从威斯利女子学院毕业，她是我这里的常客。姐姐珍妮甚至还在海恩尼斯港租了房子，陪我们住了一段时间。尤尼斯、埃塞尔还有我的其他子侄也都来了。孩子们的到来让我整个夏天都被Four Seas冰淇淋给包围着，这是科德角本地现制的一种特色冰淇淋，只有夏天才能吃到。估计我是马萨诸塞综合性医院有史以来第一个同时接受放化疗却还长胖了的病人！

随后我开始准备全国代表大会演讲。我把老朋友兼老牌演讲撰稿人鲍勃·施鲁姆请到家里来一起商量该如何准备。我只需告诉他们开场时想要说的话，鲍勃和薇琪自有办法相互配合着把余下的部分实现。

夏天一天天地过去，我感觉自己康复了不少，就像医生预计的那样，但还是没法保证我能实现自己的计划，如期参加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登台演讲。于是我们决定对整件事情继续保密，尽管当时已有报刊媒体猜出我可能会参加全国代表大会。

8月24日，星期天，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我们乘坐专机前往丹佛，同行的还有我的私人医生拉里·罗兰以及其他一些好友和家人。我们在丹佛租了一套公寓，助手们开始紧张地把我的演讲稿录入提示机。大约过了一两分钟，我举起手示意大家暂停一下。“感觉有点难受，”我说道。不知道为什么，我身体的一侧突然感到强烈的疼痛，他们迅速把我送往医院。那时我身边站着三位医生。凑巧的是，他们三个都叫拉里，要不是疼痛难忍，这本是一个实在有趣的事情。

不可思议的事情来了。在经历了脑部手术、放疗、化疗，即将登上丹佛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讲台，实现自己愿望之际，我却莫名其妙地遇到了生平第一颗肾结石。医生们忙着准备用强效药物给我镇痛，一向处乱不惊的薇琪流下了眼泪。

“如果决定采用镇静剂，你得想清楚他是否要参加今晚的演讲；你不能就这样替他做出决定；他为今晚付出了太多。”重重的压力落在了薇琪的肩上。好在医生们最后通过逆推计算得出了让人宽慰的结果：镇静剂的药效会在演讲开始之前退去，也就是说我仍然能上台演讲。后来他们告诉我，其实当时没有人想到我真会不顾一切地要去完成那个演讲。

全丹佛的医生都赶来了，叫拉里的和不叫拉里的。神经专家、泌尿专家还有其他各个领域的专家聚在了一起，我对他们表示了感谢。薇琪当时最担心的（当然也是我最担心的）并非病情的诊断，而是如何避免可能出现的药物过量和过度睡眠，我们担心会错过在百事中心的亮相。

百密一疏。负责下方的医生没能及时按照我们私下商量的结果更改药物剂量。执行药方的护士往我的体内注射了正常剂量的镇静剂，在场的人都没注意。得承认，薇琪向那位护士发了点脾气。可是事已至此，责备也没有用，镇静剂迅速起效，不知要多久才能失效。

“怎么办？”我迷迷糊糊地问薇琪。

“你可以到现场向大家挥手，”她说，“我们全家一起去，你向大家挥手就好。”

可是，我不是来丹佛跟大家挥手的。

最后我们达成了一个妥协：如果临近演讲时我仍然是昏昏沉沉的，施鲁姆就把原先准备好的讲稿压缩到四行。假设状态不错——当然，在当时看来是不太可能的——他就把原稿压缩至一半。要是在平时，这个长度的演讲对我来说简直轻而易举。

全国代表大会定于下午6点开幕。大约4点半的时候我苏醒过来，对薇琪说：“我想站起来试试能不能正常走动。”我从床走到了屋子的另一头。“不行，接着睡。”我说。

其实后来也没有睡多久，如果我们想准时赶到会场，得在6点钟以前出发。突如其来的事情让我根本没有时间在演讲提示机上演练，而且我两天没有碰稿子了，也就是说两天都没练习了。没办法，我们在医院洗了澡，换了身衣服。助手们一边盯着手表，一边为我整理头发，其他人则忙着把我的手用织布绷带包起来，遮住静脉滴管。

拉里·霍洛维茨正忙着跟百事中心通电话，那边想知道究竟应该把哪个版本的讲稿放进提示机。我坚持用曾经在科德角演练过的原本，但是薇琪和拉里说服了我用施鲁姆删节后的版本。

“出发吧。”我对大家说。三个拉里——拉里·罗兰、拉里·霍洛维茨和拉里·阿伦把我们护送上了门外等候的面包车，拉里·阿伦是我们在杜克医学中心做手术时认识的一位很棒的青年医生，碰巧他当时也在丹佛。薇琪和我坐在中间一排，我们前面是司机，后面是医生，一行人坐着车朝一个我从未去过的会场奔去，我甚至不知道它的讲台究竟是什么形状，却要在那做了一个还没来得及预习的演讲。即便我曾演练过没有删节的演讲稿，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能做到，我不停地告诉自己，我能做到。

大会终于开始了。侄女卡洛琳·肯尼迪首先登台做了一个漂亮又温暖人心的开场介绍，紧接着大会播放了由马克·赫尔佐格和肯·伯恩斯导演的精彩短片，然后我

听到了主持人的声音：“女士们先生们，有请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

来了，演出开始。

薇琪陪我一起走上讲台，把我送到话筒前，她捧着我的脸亲吻了一下，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和家人坐在一起。

我慢慢定下心来。

2008年8月25日，星期一的晚上，我实现了自己永不放弃的梦想。“站在这里感觉好极了，”我向各位激动的代表说道，“没有任何事情，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我和大家共度这个特别的夜晚。”

我对在场的朋友们和家人们表示了感激：不论成功、挫折，胜利、失败，数十年他们坚定地站在我的身后。我向在场的所有人做出了承诺，一定会在2009年1月继续履行自己的参议员使命，把人人都负担得起的医疗视作人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我们面临着又一次的挑战，如果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无疑终会到达胜利的彼岸——这不仅仅是民主党的胜利，更是这个国家的复兴。”

演讲临近结束，讲稿的最后一句需要一个特别的高调来演绎，其中有约翰·肯尼迪的著名演讲词。我深吸了一口气，憋足了一股劲，把杰克和我的语言一气贯通：

“11月，新一代的美国人将要接过火炬，让我们和巴拉克·奥巴马一起——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事业而努力——让万物更新，让希望重现，让梦想永隽。”

正是这次新旧希望的交替和那永不磨灭的梦想让我决定写作这部传记。在健康问题突然出现之前数年，我就已经开始通过弗吉尼亚大学的口述历史项目有意识地收集一些个人的记忆，私人方面的、工作上的都有。此外，我还保留着55年来的私人笔记和日记，希望这些材料能够有助于记录我的一生。

在与病魔顽强斗争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一直都和家人密不可分。坐在门廊前，享受阳光和清新海风，我好想念他们：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他们都已离去，只剩下我和珍妮，但他们每个人都鲜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虽然大家品赋不同、性格迥异，但我们都全心全意地融入了这个大家庭。这是一个充满了爱和真理却又风雨不侵的世界，此中真意，非外人可以窥悟。

我的故事即是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故事即是我的故事。

于是，这里有我们共同的故事。

Contents | 目录
True Compass A Memoir

2008 / I

第一章 我的家

- 1941 港湾 / 3
- 1932—1938 不许哭 / 17
- 1938—1939 战时伦敦 / 27
- 1940—1950 小寄宿生 / 34
- 1950—1958 我的哈佛 / 57

第二章 兄长

- 1958—1960 总统哥哥 / 77
- 1960—1961 薪火相传 / 99
- 1961—1962 新边疆 / 114
- 1962 三杯酒 / 125
- 1963 一九六三 / 133